

从范公堤下,沿231省道西行14公里,便是建湖县庆丰镇北秦庄村地界。村部在南,挨着路边,坐东朝西。门前有一条河,河边有位50多岁的先生在钓鱼,我问他去秦氏宗祠的路怎么走,但他不是本地人,要我问村干部。村部的大门开着,我本不打算找村干部,外面干根线,进村一根针,哪有那么多时间应对?但还是走了进去,在值班室里见到了秦卫东,服务卡上写着,他是民兵营长,听说我要去秦氏宗祠,很热情,给我联系上了秦立生,村卫生室医生,爱好村史研究。

沿村部门前的路南行两公里,便是北秦庄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村落,庄上的老人们说,他们的祖先是高邮的秦少游,我以为是北宋词人秦观,但他们说不是。更多的人,并不以为秦观与秦少游是同一个人。问起高邮人怎么从无锡迁过来的,他们就无从说起了。这漫长的历史,谁会在意呢?

秦少游宋元丰八年(1085)考中进士,任过国史馆编修,绍圣年间死于滕州(今广西滕县),南宋建炎四年(1130)被迫赠龙图阁直学士,其子秦湛宋政和年间(1111—1118)任常州通判时,定居常州武进,于是就将秦观之柩葬于无锡惠山(当时无锡为常州辖地)。南宋末年,秦湛十世孙秦惟祯(瑞五)从武进进入赘于无锡富安乡胡埭王野舟家,秦惟祯之孙秦彦和在元代末年,从胡埭迁居城中六箭河北岸玄文里,其后裔被族内称“河上秦”。明代成化二十二年(1486),秦惟祯七世孙秦金又自胡埭之张舍迁居县城西水关,其后裔被族内称“西关秦”。

北秦庄的秦氏是西关秦的后代。但他们什么时候来到这里,谁也说不清楚,族谱上说:“相传明朝洪武年间,秦氏祖先约文公自江南水乡无锡迁徙至此。”秦立生说,这个庄子原来叫秦家庄,到清代中叶,姓秦的住户已超过200户,人口近千,秦家庄住不下了,便在庄东南五六里处选址又筑一庄,于是,就有了南秦庄与北秦庄之分。秦立生将我带到庄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,说当年的秦氏宗祠就在这里。现已了无痕迹。收割的菜籽秸秆倒在路边,田间一半长着玉米,另一半长着黄豆,周边杂草丛生,自由得肆意。这是这个庄子最高的地方,北面有一条小河,呈月牙形,庄前也有一条河,是水网地区的主要通道。当年选址建祠的人一定是懂点相地之术,这里有风的元气与场能,亦有水的流动与变化,气象不一般。

秦立生说,当年,鲁艺的学生就住在这个祠堂里。

秦立生所说的鲁艺,就是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,简称华中鲁艺。

新四军首指在盐城办学校的是刘少奇,那是1940年秋,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主力部队奉命挺进苏北,落脚点是盐城。刘少奇在率领中原局干部离开淮南前,就考虑到盐城后创办学校。1940年11月,黄桥决战胜利,北上的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在白驹狮子口会师,刘少奇与陈毅在海安见面时,把办学校的事情提了出来。起初,只是想办一所学校能争取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工作,培养文化干部,在征求意见时,同志们认为这所学校应该像延安的鲁艺,于是,采纳了大家的意见,定名为“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”,并决定由丘东平、刘保罗、陈岛、莫朴、孟波等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,丘东平为筹委会主任。随后,刘少奇在盐城召开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筹委会议,确定学制为6个月,分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14个系,第一期计划招生400人,校址设在盐城贫儿院(旧址)。紧接着,华中鲁艺筹委会在《江淮日报》上刊登了招生启事,向各地印发招生简章,并在盐城、东台、海安、阜宁等地设报名点,经过政治考查与专业考试后确定录取。一个月后,已有215名学生报到,大部分来自上海和长江下游的南通、如皋以及盐阜当地的知识青年,还有远自大后方的重庆、桂林、广东、福建等地的知识分子和南洋归来的华侨,也有部分学员是从部队调来的。

本来,华中鲁艺的开学典礼安排在1941年1月份,“皖南事变”突发,未能如愿。

皖南事变中,军长叶挺被俘,副军长项英、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,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,震惊中外。1月20日,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。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,重建新四军军部,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,刘少奇为政治委员。1月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盐城召开。

2月8日,华中鲁艺在盐城举行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。刘少奇、陈毅、赖传珠等出席大会,院址设在兜率寺、贫儿院等处。陈毅曾以陈仲弘的署名,给许广平写信,邀请她担任华中鲁艺的院长,并派许幸之前往上海面请。许广平忙于整理鲁迅全集,未能前来。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院长由刘少奇兼任,丘东平任教导主任。并由丘东平、何士德、陈岛、孟波、莫朴、刘保罗等六人组成院务委员会。华中鲁艺的学员们抗战宣传激情日益高涨,创作了《新翻版》《汪逆之泪》等作品,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,公演了《皖南一家》《王玉凤》《惊弓之鸟》等剧目,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抗

波兰,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宁静。波兰的首都华沙是一座古老的都市,曾多次遭受战火洗礼,铁蹄蹂躏,然而她仍旧坚强地挺立在欧洲大地上,不屈也不挠。你去仰望任何一座建筑,它们都沉默无言,坚如磐,绝不透露出任何的哀怨以及愁绪。它们平静得如一面湖水,把波澜与涟漪都深藏于心灵深处,人和风光,皆似画面上的静物。这里绝无喧嚣和张扬,连那迎面吹来的巷风,似乎都在说:嘘——请保持安静。距离皇宫不远处,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心广场,广场周边除了建筑物、树木花草、咖啡桌之外,少见人影和车马。石片铺成的一块块地面,犹似一声声叹息,踏在上面,给人以沉重之感。这里曾经有过炮火、弹痕、血和泪的记忆,所以波兰国歌的名字就叫《波兰没有灭亡》。这是一个辛酸而又坚韧的历史表述。往往,宁静里潜藏着一个族群的坚毅和复兴的力量,就如波兰这个英雄的民族。就是这个英雄的民族,曾经养育过哥白尼、居里夫人、肖邦这样的惊世天才。噢,对了,伟大的女性——居里夫人的出生地,离此不远,平平常常的土黄色楼房,静谧的一扇小门,小小的门牌上用波兰文写着:居里夫人出生地。除此之外,再没有任何的张扬和炫耀。

在我满脑子里想着居里夫人童年生活景象的时候,远处圣约翰教堂的钟声轰轰然荡来,也恰好此时,一群鸽子飞起又飞落,恰似一束向天空抛撒的鲜花,又随风落于原处。仿佛它们在举行



日真反共的阴谋活动,并创作数以千计的以宣传反投降、反“扫荡”、减租减息、参军参战、统战政策等为中心内容的版画、漫画、宣传画,进村入户,激发大家的抗日激情。6月初,为了保卫夏收,保卫根据地,华中鲁艺提前结束了专业课学习,将师生编成三个中队和一个服务团,深入到盐城各地农村,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实习。一边帮助群众劳动,一边进行抗日宣传,动员了近2000名农民参加自卫队,或参加新四军,显示了抗战文艺的巨大作用。

随着新四军军部的重建,华中鲁艺的广泛宣传,苏北地区的抗日形势如火如荼,盐城也成了国民党与汪伪政府的围攻重地。6月下旬,为应对日伪军的扫荡,华中鲁艺由盐城撤到西20公里的陶家巷,7月23日,军部要求他们立即疏散,分成两队,一队由黄源、何士德、莫璞负责,随军部转移;二队由孟波、丘东平、许晴负责,经吉家庄、北秦庄,去楼王庄。23日傍晚从陶家舍出发,24日凌晨到达北秦庄,由于太困了,学员们纷纷要求就地宿营,等天亮后再走,于是就在秦氏祠堂和附近村民家住了下来。

听到第一阵枪声的时候,警卫班的周占熊“向场头抽烟的农民打听”枪声的方位,之后报告了丘东平……

秦立生说那个“抽烟的农民”就是他祖父。他说在这里能看到的场头只有我家,他又指了指西边祖屋的位置。他说得有道理,按《北秦庄突围》(戴文兵整理,刊于建湖县党委史办公室1986年编印的《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》)记载:“全庄一片寂静,只有一个老农民在场头上的小草棚里抽着旱烟,一明一暗地闪烁着萤火虫一样的亮光。”这个抽烟的应该是秦立生的祖父秦建德。秦立生没有见过祖父,他父亲说祖父1957年去世,村里为他开追悼会时才知道他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当时是财粮员,他编的宣传妇女解放的乡村小调,流传至今,如:“谁说乌盆不是盆?谁说女人不是人?针头线脑鞋头袜脑脑头灶脑样样能,没有女人这个日子怎么成!”

北秦庄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,西边也有一条河,东南到西北走向,叫黄泥沟,与庄前的河交叉着,这样,庄前就有了两座桥,一座在庄东南,一座在庄西南,呈牛角状,当地人统称牛角桥,也叫东牛桥与西牛桥。丘东平、许晴与孟波理清了地理位置,分析了敌情后,随即集合师生,过东牛桥去东南,许晴在下面,丘东平居中,孟波断后。大概只有一半师生过桥,就停了下来,先是碰到了两个人(后来证实这两个人是日伪军的密探),后又碰到了五区区长魏心一,魏心一说前面有敌人,队伍立即回转,这时枪响了,许晴带着警卫班的战士阻击敌人,孟波带着桥北的师生后撤,丘东平指挥人突围过桥。

许晴组织阻击,当时只有8个人,几根拉栓式步枪,又能有多少子弹?放几枪也就没了,怎么也无法与日伪军的歪把

子机关枪比,子弹雨点般压了过来。突围出去的人与桥北的人穿过北秦庄,向西北奔跑,进入了青纱帐,没有过桥的人,有的倒地装死,有的潜入稻田深处,躲了起来,跑在桥上、跳进水中、奋力反抗的人都被杀害……

据史料记载,北秦庄之役共牺牲35人,其中,华中鲁艺27人,当地村民8人。秦立生把我带到庄前的河边,指点东牛桥的位置。这座对于华中鲁艺人来说有着生死之分的桥早已拆除,桥墩的那两墩土依然蹲在那里,隔河相对,守望着如梭岁月。听说我为那年“六月初一”的事而来,围上了好多人,都是长者。当地人对生死之期,都以农历记取。六月初一是“庄祭”,这一天,北秦庄烧纸的人家最多,为北秦庄人,也为那些死去的华中鲁艺人,他们为了一个平等、民主与自由的新中国,远离父母,客死他乡,北秦庄人能不为他们烧点纸?我问,近来报纸上说的“八女投河”,是这条河吗?秦中照接上了话,他说是的,就在月字头。说罢,就带我去。秦中照生于1940年,1974年他是所在地的生产队长,那年华中鲁艺幸存者来这条河边祭拜时,他参加接待,他的“据说”与“听说”更接近于真实。

东牛桥沿河向东三十米左右,河的南岸有个月牙弯,当地人称之为月字头。秦中照说,当年那里漂尸一片,血染河红。我问这条河叫什么河?庄上的人相互望了望,说不出。建湖属河网地区,沟河很多,有的还真没名字,庄子西有建港河,东有西塘河,没有人在意这条河叫什么,本庄人说这条河上的事,不需要名字,一说都知道。我说,能不能就叫它“八女河”?庄上的人再相望。秦立生说,前面那条河,解放前是一位地主疏浚的,专为迎候出嫁的女儿坐船回娘家,叫“女儿

## 北秦庄:华中鲁艺在这里定格

□赵永生

河”,我们这河叫“八女河”也是有道理的。庄子上的人又相互望了望。这河在,这河的月字头在,这河岸的泥土深印着她们奔跑的痕迹,这河水仍有她们映照的影子,这日月总是按时序眷顾着,给她们一个名分,多好!我不知道这河究竟有没有名字,也不知道庄子上的人会不会从此叫它为“八女河”,但我知道,时空虽逝,大地永在。

在突围中,丘东平过了桥,他是在敌人完全封锁那座桥前,霎时间冲过桥的,幸存者凌新2007年回忆时说(2007年作家出版社《咱们鲁艺的老师》之《见到丘东平最后那一刻》),“到丘东平身旁不远,我使劲喊丘主任快撤,话没说完,一颗炮弹落了下来。”凌新没有冲过桥,她不会游泳,也没有涉水过河,她在稻田里躲了起来,她再次见到丘东平,是在往目的地的路上,与同学朗静一起,遇到了一位村干部,说此前牺牲了一名同志,好像是鲁艺的,走近一看,是丘东平。

丘东平,1910年5月出生,广东海丰人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过广东海陆丰农民起义、左联文化运动,1938年加入新四军,任政治部政工科长兼陈毅的外事秘书,华中鲁艺的筹委会主任,也曾担任教导主任。最为出彩的是他文学创作的成就,作品具有七月派作家的现实主义风格,充满对生活的苦难和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,郭沫若称其为“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先影,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”。

离开北秦庄,我就顺着道去找丘东平牺牲的地方,我想看看他究竟倒在了一个什么地方。回到231省道,西行3公里,就是东平村的地界。合作化时,这个地方叫东平合作社,文化大革命时,分为两个大队,东边叫东方大队,西边叫红日大队,撤社建乡时,分叫东方村与红日村,2005年撤乡并村时,又合二为一,叫东平村。路标的不远处,有对夫妇在斜坡上翻地,先生叫周加明,72岁,他说十边地,派不上大用场,种几行玉米,栽几棵山芋。我问他知道丘东平吗?他说知道,东平村就是纪念他的,我问丘东平最后倒在什么地方?他转头指着不远处的路对面,说:就在陆家那墩坎子上,两合头白墙那户人家。我问他怎么看待丘东平的死,他说他的父辈们非常待见他,四时八节都祷告,为他烧纸,替他填坟,现在的人不大想到他了,那年代,真不容易。周加明先生也有感慨。

陆家人在场边的田里忙着,主人叫陆风成,72岁,怀里圈着个塑料筒,一把把在撒种,“鸟不食”将手染得殷红,老伴在挖墒。稻麦两季,麦收后的田间,经过耕翻与破钱,加上薄水一层,土味浓郁,复合肥的白色晶体,散落在杂乱的麦茬间,有一种诗意的点缀。陆风成听了来意,就上岸,把我带到他家的西墩坎旁——史料中记载的“三棵小桑树,一个小草堆”的地方,他说:丘东平当年就倒在这里。

丘东平当年是沿着黄泥沟走到这里,因建231省道,此沟

被隔断了,路南,沟还在,远望也隐约可见,陆风成墩坎下的沟也在,本来是黄泥沟的尽头,现在断了水脉,成了绝头沟,但依然清水汪汪,荷叶田田。我问陆老,能否竖一块“丘东平殉难处”的纪念碑?他不假思索,说当然可以。

关于丘东平之死,1985年曾引起争论,这场争论缘于庞瑞垠的小说《东平之死》。

庞瑞垠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,他的“故都三部曲”《寒星》《危城》《落日》,写南京的繁华与蒋家王朝的没落,写风雨飘摇年代的日月星辰与人间烟火,赞誉多多。与其他作家相比,庞先生更注重历史人物的直面书写,从细微处剖析人性,表明介于政治与革命中的人,如同万物介于自然,选择,有时也是一种无奈。庞先生写过《姚迁之死》《陈布雷之死》,但像《东平之死》的如此反响,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
《东平之死》的焦点不是写东平的死,而是东平是怎么死的。庞先生以小说家的思维调用史料,刻画了丘东平这样一个作家在腥风血雨年代中心理的复杂状态,人物栩栩如生,体现了作家对历史传记书写所具备的史才、史学、史识,他的高妙之处在于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与历史人物的正常思维,他告诉人们,丘东平是自杀的,自杀是有原因的。而以草明、孟波为代表的第四军老战士则说庞瑞垠污辱了丘东平,他是被敌人打死的,是牺牲,不是自杀。

作家草明与丘东平早年共事,并于1937年共同创作过一篇题为《给予者》的中篇小说。孟波,作曲家,是北秦庄事件的亲历者,按那天的分工,他断后,因此安全撤离了。草明看了庞瑞垠的《东平之死》之后,给孟波写信,表达了她的气愤。孟波给草明回了信,信的大意是说他不在现场,他曾访问过时任天津话剧团团长的沙惟,沙惟是在丘东平指挥下成功突围的,从他身边走过,但沙惟说东平牺牲时他也不在场。在回信中,孟波同时告诉草明,当时他也问过屋里的一位农民,农民告诉他,他(丘东平)已经在屋后,机关枪扫不到了,孟波认为也不在步枪的射程范围,脑门上的枪眼也不是机枪子弹而像手枪子弹。草明给《小说选刊》(原载《当代》文学季刊)写信,认为《东平之死》在“死的性质的关键之处与事实不符”。并附上孟波给她的信。《小说选刊》把草明、孟波的信转给了庞瑞垠,庞瑞垠就这两封信的质疑提出了事实根据。于是,《小说选刊》把这三封信同时刊出。

据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馆藏资料中孟波、章枚、沙地的回忆录《北秦庄突围》中记载:丘东平“毅然决然地拔出手枪,将仅剩的一粒子弹上了膛,对准自己的脑袋,壮烈地为革命献身了……”建湖县委曾于1957年组成一个调查组,用了6天时间,对丘东平的死做过专题调查,参加调查的谷龙先、吕国爱、金占鳌三个于1957年5月31日写出报告(现在存建湖县档案局):“他用枪按住自己的太阳穴,一声响,东平同志倒下了水田……”并注明“当时陆应广、陆长关等人看得听得清清楚楚”。

无论是否自杀,都与懦夫无关,都是烈士在当时情境的艰难抉择。我们应该坦诚面对与尊重他的选择。

从华中鲁艺的校友名录中,我们得知,当时共有师生215名,二分队当时是多少人,现在没有确切的数字,综合现存的史料,7月24日那天牺牲了27人(这个数字很准确,事后就安葬了这么多),包括新安旅行团队2人。被捕61人,其中,留盐城31名,他们在日伪政府做调查统计工作,后除一名做了日本人翻译外,都跑了;送30名去南通,后被保释20人,跑了8人,一女子做了伪军营长的姨太太,那惟等人被送往上海,后被营救归队。

其实,这是一场遭遇战,事后得知,日伪军是偷袭《江淮日报》的,报社得到情报后,已经撤离,华中鲁艺二分队的师生们一无所知,撞个正着——战争就是这样无情。新四军军部也检讨了北秦庄事件中的华中鲁艺工作,比如,根据地不同于解放区,办学条件是否成熟?没有武装力量的保护,非战斗群体的安全谁来保证?1941年8月中旬,新四军军部吸取北秦庄事件教训,解散了华中鲁艺,学员们一部分参加地方工作,另一部分进了新组建的军、师两个鲁迅艺术工作团。

从1941年2月8日成立,到8月解散,历史将华中鲁艺定格在北秦庄。



是幻映在天空里的画面,而是这画面已是刻在我心灵深处的一处诗碑。

唐诗人王湾有诗:“客路青山外,行舟绿水前。”青山也好,绿水也罢,我总是要离开这里,我的行程,不仅仅是“风正一帆悬”就可以完成的,而是在一万多米的高空,将要飞行数万公里。异国他乡,这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,酝酿了多少遍的诗篇,猛然出现在眼前时,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呢?天人合一,在我们古老的中国,这是妇孺皆知的命题,然而,谁又把它真正铭刻在灵魂深处了呢?

这不是小题大作,喂鸽子原本就是一件极平常的事,然而,真正怀有善美之心来喂养的又有几人呢?记得有一年,在广场里训练了一群鸽子,人与鸽可以亲密接触了,一位做妈妈的中年女子,让宝宝去喂鸽子,在童心的感召下,一只红脖子鸽,让宝宝抱在怀里,就在此时,做妈妈的跑过来,一手抓起鸽子,掉头就跑,好在养鸽子发现得早,不然后果难料。

所以说,在这个人世间,既有圣母和菩萨,又有母夜叉和血腥之徒。所幸的是,在当今中国,圣母菩萨们日益多了起来,而母夜叉和血腥之人则少了许多,这是一个质的变化,我们那个“天人合一”的哲理命题,正在重新被重视,重新被宣扬,重新被铭刻在人们心里。

而波兰那一位慈祥的妇人,和那一群幸运的鸽子,留在了我的相机里,更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,是不是也是一个缘分呢?

■行 走

## 喂鸽子的妇人——波兰散记

□查 干



无边亦无际地伸展开去,只要有一丝清风,就可以去遨游八极的样子。

朦胧间,在广场上空又一次出现以上镜头:东欧的宁静之日,在波兰首都华沙的自由广场,在广场中央,一弯土黄色的木制长椅,长椅上坐着一位慈悲的圣母,不,应该说,坐着一位普普通

通的中年妇人,她穿着白色上衣、灰蓝色牛仔长裤,脚蹬运动鞋,身边放着白色挎包,手里拿着一个赤色米袋,米袋里装着一些鸽食,她把鸽食一把又一把地掏出来,一只又一只地去喂鸽子……

这些写实,前面已经有过了,现在我再来重复一遍,因为这不是相机边边的写意,也不仅仅